

華夷之變：黃錦樹的 「民國經驗」與馬共文學書寫

• 張斯翔

摘要：本文從「僑」之身份所引發的「華夷之變」視角切入，在民國—台灣與馬華族群之於馬來西亞歷史的背景中，試圖解讀黃錦樹在台、馬文學場域中後移民/夷民的兩屬/兩不屬身份——黃錦樹從馬來西亞華人移民第三代，變成台灣新住民第一代，從一種「外國人」（對台灣而言是留台的馬來西亞人）變成另一種「外國人」（對馬來西亞而言是已入籍台灣的馬華作家）；並從黃錦樹小說的互文關係，進一步探究其馬共書寫的「民國經驗」內涵。本文指出，「移動」作為馬華文學不可迴避的歷史現實，已產生了極其重要的、不在馬來西亞的另類混成文學底蘊。黃錦樹介入民國的方式，不只帶有馬來西亞立場，同時也帶有民國—台灣如何形成的歷史背景，兩者又是與現實生命情境相互勾聯融合、建構又同時消解的華夷之變過程。華夷間在移動的風潮下早已產生邊界模糊的間距，而以虛構的文本介入，讓我們看到華夷間距的增加、混搭，曾經被想像建構的、被以為原有的華夷邊界正逐步減退。

關鍵詞：華夷之變 僑生 黃錦樹 「民國經驗」 馬共

一 前言

《廣韻·平聲·宵韻》中有言：「僑，寄也，客也。」從中華民國1949年遷台後的早年立場來說，海外華裔都是中華民族客寄於國土之外者；但從作家黃錦樹這類已經入籍的馬來西亞華人（馬華）來看，其實也可以理解為客寄於民國的外邦人^①。黃錦樹祖籍福建，在馬來西亞已是土生土長的華人移民第三代。然而本土大專教育對獨中生（華文獨立中學學生）的排擠，加上家有十四個兄弟姐妹（黃錦樹排行第十）的背景，民國的僑生教育成為黃錦樹重要的生命經歷。1986年黃錦樹到台灣求學，他曾在文中提到：「我來台來得勉強，然而如果不走，在馬來西亞也許一點機會也沒有。」^②故如黃錦樹這樣的馬來西亞僑生，天生就帶着一種出走的動機。

在本文的討論中，「僑」可被歸於異地/夷地出身者，且因處異地而帶有「夷」質。當移民之後，華人有了移民身份，其後代面對本土主義者對其祖先族裔血統上的本質性認定，則無可奈何承繼着完而不了的後移民身份。這裏我們可以簡單地將「移民後」認定為第一代移民所面對的處境，而「後移民」則是移民第二、三代土生土長者仍被動賦予移民屬性的困境。本文借助王德威提出的「華夷之變」新視角及其「包括在外」的「間距」概念^③，以探究馬來亞共產黨在馬來西亞歷史中被「包括在外」的境遇，如何造就一代代馬華的游離境況。而黃錦樹在2007年入籍台灣之後，他面對的是華夷之變中，台灣與馬來西亞之間兩屬/兩不屬的身份處境。這一個身份處境或正符合了王德威所提出的間距能量，使黃錦樹的小說從中得到一種生發動能。此外，民國—馬華—馬來人及其種族主義的互動與何者為「夷」的變動也是極重要的着眼點。1949年兩岸分治，國民黨治下的台灣常以中華正統自居。民國在台灣長時間塑造自身為海外華人可資想像的文化根源與中心，以此為前提積極推展海外華僑教育，讓散布世界各地的華裔子弟有機會到「祖國」接受教育。正因如此，像黃錦樹這種僑生，在台灣本土主義興起之後的民國—台灣時期^④，其所認同的「華」與自身的「夷」使其處境更複雜且尷尬——「『僑生』的結構位置和外省人一樣，不是台灣的僑生，而是民國的僑生。我們一開始就被卡在台灣/民國的夾縫裏」^⑤。

當我們閱讀黃錦樹於民國—台灣所創作的馬共小說時，從其第一篇〈大卷宗〉始，即可見其運用作為歷史債務的馬共遺事，在後世的馬華族群身上不斷索取利息的寫作意識^⑥。本文提到的「債務」，其意義在於馬共歷史已告一段落，後來者不過是於馬共之後的時間軸中持續着的「延長賽」。馬共的存在（1930-1989）作為真實歷史受到馬來西亞官方隱蔽，甚至在新生代記憶中或已缺席。但它曾經存在、並在一段頗長時期其成員以華人為主的事實，卻成了馬華族群面對種族主義困局時隱藏其後的構成因素之一。筆者認為，黃錦樹不同時期的身份屬性：後移民的馬來西亞本土第三代、移民後的民國第一代、僑生，乃至於在台外僑時期的游離、後馬共時代的馬華族群境遇，這些華夷之變累加並滋養出其文學底蘊。馬共在黃錦樹筆下是「延長賽」，而民國對其而言是傷停時間。馬共的存在成為其中一把種族主義排他性的刀刃，而在台灣本土主義的興起中，民國也在某程度上成為了其中的異質。我們甚至可以說，從民國到台灣，僑生政策及僑生身份的認知面對不需以中華中心自居的台灣本土意識，也是另類尷尬的「延長賽」。

民國—台灣文學相較於馬國本土寫作環境及題材的鬆綁，使馬共書寫成為可能，而黃錦樹復以馬共書寫回應了自身的「民國經驗」。學界就黃錦樹文學書寫的研究，近年較集中討論者有高嘉謙、顏健富、黃祖恩等對其小說中意象、寓言與「憂族」書寫的論述；劉淑貞就其文學語言探究其中文現代主義；高嘉謙將其作為個案置入離散馬華文學史框架中進行論述；黃錦樹馬共小說的研究，則有蘇穎欣及筆者的文章可供參酌。劉淑貞提到「黃錦樹的文論、批評、小說寫作甚至及其自身所具有的文化身份，其實是一組倫理與美學不可分的整體結構」，並指出黃錦樹文學作品中的「破中文」，「不一定在回應一個精準意義下的『中國性』，但它必然在回應一個『不在』的『中國性』，卻弔詭地因為這個否定性的『不在』而暴露其內部缺席的『中國性』，並且在缺席

的意義上以美學贖回一種補償的『中國性』」。這兩點對本文「以黃錦樹論黃錦樹」的論述方法影響甚大，且使筆者更着力關注黃錦樹小說中的「沒有」所形成的書寫張力。高嘉謙梳理了黃錦樹文學史視域與小說視野可能存在的內在連結，以回應黃錦樹離散敘事的生產結構^⑦。如此論述及連結，啟發筆者開展了黃錦樹的身份如何可能對應馬華族群的集體境遇的視野。

本文從「僑」之身份所引發的華夷之變視角切入，在民國—台灣與馬華族群之於馬來西亞歷史的背景中，試圖解讀黃錦樹在台、馬文學場域中後移民/夷民的兩屬/兩不屬身份，並從黃錦樹小說的互文關係，進一步探究其馬共書寫所蘊含的「民國經驗」內涵。以下依次從黃錦樹小說中「慢船」的意象分析出發，釐清其中所呈現的象徵系統和背後的意識形態及根源；並引入「遲來的移民」觀點，讓華夷之變的間距能量顯形；進一步通過分析更多的黃錦樹馬共書寫，建構以下脈絡的連結性：馬共歷史的「存有」及「沒有」在某程度上導致華人在馬來西亞的特殊處境—離散作為尋找出路的可能—民國僑務的收納—民國在台灣主體意識建構中逐漸遠去—離散的華人與華文文學在時差中第二次經歷本土的離散性。這些時差或「不合時宜」都可以帶入到華夷之變的間距論點中，並以此視角試圖尋找其應處的位置。

二 航向/離開民國的慢船：流亡與位置

黃錦樹的小說創作，從華人文化的餘骸開始，其後展開大量馬共書寫，再回到籠罩在華人文化與冷戰格局的左右翼之爭裏自身所站的「民國位置」。他於《民國的慢船》(2019)中大量調度了以往作品的人物、事件及空間，從書寫策略上，這些小說的互文性，或正可回答部分論者對黃錦樹不寫長篇小說的質疑^⑧。黃錦樹各短篇小說間看似互文，但卻不止於互文，尚有高度相關的同一時空前後故事的連結。《民國的慢船》乃作為一媒介，將《刻背》(2001, 2014)、《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2013)、《猶見扶餘》(2014)等小說集的馬共/民國書寫串連起來，相互作用；並在其中運用後設的虛構手法，將原本作為主體的小說內容本身，以虛構的小說文本身份出現，甚至將這些小說的作者也虛構成亦真亦假的、虛空中的某人，或是虛構的「黃錦樹」。正如收錄在《民國的慢船》的〈細雨微風〉中提到，〈最後的家土〉乃描寫一女孩懷孕後被始亂終棄，跑到森林中居住土樓的故事，而這土樓聚落的形成與持續，又猶如真正的「南洋人民共和國」。如〈細雨微風〉中小玉寫給二伯的信提到：「爸說，您不喜歡電子產品，也不用電郵之類的，就像您年輕時的小說〈魚骸〉中的老頭子，把自己關在自己用文字織成的蜘蛛網裏。」這位二伯還參與編輯了《膠林深處》^⑨——黃錦樹似乎有意將自己的作者身份抹除，或帶入到小說中，讓作者黃錦樹的分身成為新小說裏其中一個角色。而對過往小說的不斷帶入，使得閱讀黃錦樹成為了以書為單位來完成的行為^⑩：

母親看到您的小說〈最後的家土〉為甚麼會好幾天都睡不着覺，有時還偷偷啜泣，然後把那些陳年舊信連同沒有蓋章的郵票，一封一封的親手放到橡膠枯枝的火裏，燒掉了。

那故事的核心，其實是她的故事吧。順便告訴您，您的每一部小說她都有買，好像是交代檳城的書店有新書就直接給她寄，有時也會建議我讀讀看。多年來，她一直維持着閱讀的習慣。最近她桌上擺的是您和朋友合編的《膠林深處》，好多篇文章都用橡膠落葉當書籤隔開。落葉夾多了，書也膨脹了，就好像落葉是另一種書頁。

黃錦樹小說不斷書寫前作的補遺，或正如他說的：歷史是破船，而書寫是修補的形式^①，他不斷用新的小說去修補之前的小說。這讓讀者陷入了兩難局面：黃錦樹若不停止寫作，讀者也許沒有一個看到全貌盡頭的機會；但若他停止寫作，這些小說的、生命的「漏洞」（《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序標題〈關於漏洞及其他（自序）〉）又有誰能來補？從這一點來說，《民國的慢船》在其小說集中，階段性地扮演了樞紐角色。

在《民國的慢船》收錄的《南方人物周刊》訪問中，黃錦樹談到出生於馬來西亞婆羅洲的旅台作家李永平時說：「他找不到他的立足點了。在台灣，他不可能是先天政治正確的台灣人（編者註：李永平在1987年入籍中華民國）。1949年後的民國遺民被稱做外省人，我們這些更晚的移民就是比外省人更外的外省人。所以你的立足點在哪裏？寫台灣，你不如當地人政治正確（不夠『草根』），寫婆羅洲，你又離開太久並且也沒有再去了解過，所以就非常被動。」^②這裏「比外省人更外的外省人」、且政治不夠正確的無所依歸感，黃錦樹說的雖是李永平個案，但何嘗不是以此自況？只是他認為自己「比他清醒，也比他自覺」，也提到「我早已自覺承擔馬華文學那個『沉重的沒有』，也知道該做的都是操之在我的事。操之在人的，就不必操心了」^③。他認同自身所背負的「沒有」，且那個「沒有」所來自的地方也回不去了。

2019年4月《季風帶》雜誌有一位筆名「南洋客」的作者，發表了一首詩《那年我不回馬來西亞》^④。這個題目馬上就能對應到留台馬華詩人陳強華的成名作《那年我回到馬來西亞》，但同時也對應到黃錦樹的兩篇小說〈那年我回到馬來西亞〉^⑤及〈那年我回到馬來西亞〉^⑥。這首詩後來收入《民國的慢船》，但黃錦樹在雜誌上發表時特意使用了「南洋客」的筆名，筆者以為也應該將之看做內容的一部分。這筆名暗藏了兩種視角的身份屬性——客自南洋來之於民國的外人身份，但在「那年我不回馬來西亞」這個標題的襯托下，可同時視作早已客於南洋的自況。黃錦樹從馬華移民第三代，變成台灣新住民第一代，從一種「外國人」（對台灣而言是留台的馬來西亞人）變成另一種「外國人」（對馬來西亞而言是已入籍台灣的馬華作家），自然會容易對如是感歎產生共鳴：「一個異鄉人，能在這艘擱淺的民國慢船上給自己找到位子，也是很不容易的事。」^⑦

而《民國的慢船》小說集的〈跋〉更提到書名邏輯：「書名包含了去與來，在去來之間，也可說是一種流亡的狀態，沒有位置的位置。」^⑧黃錦樹對「位置」似乎念茲在茲，但卻認清自我及在台馬華文學都只能擁有一個流亡的、沒有位置的位置。而這一點，或可視為一種移動的華夷變態動能，讓這些同時被台灣文學及本土馬華文學「包括在外」的馬華文學寫作者，繼續書寫那個馬華文學的「沒有」^⑨。只是在造就這一支文學脈絡的曾經的沃土上，「民國」從正當性到認同感，都已面臨百年來前所未有的極大變動。作者特意讓〈論寫作

(搞定遺孀)中的人物N「吭亮」地說出「擱淺的民國慢船」²⁰——「擱淺」不同於觸礁或沉沒，後者都有碰到阻礙或下沉的意象，而擱淺卻更可能是因為承載這艘民國慢船的水域太淺、太小，擱淺後的慢船仍舊存在，但卻無法繼續航行，只能成為這塊淺灘上另類的擺設，或是黃錦樹曾用過的意象：盆栽。黃錦樹曾以盆栽境遇形容馬華文學及馬共處境：受困於一個窄小的牆內，像罐頭裏的沙丁魚。如果要突圍，必須超出馬華文學的視野來思考馬華文學……馬華文學單憑蕉風椰雨、方言土語、熱帶故事是不足以讓它在現代中文文學的戰場裏找到位置的，它必須更激進、更全面地調動世界文學的資源，甚至開展出完全不一樣的敘事形式²¹。這裏的盆栽就成了另一種在固有受限的空間內有限發展的隱喻，展現了黃錦樹對民國或者在民國之中的馬華文學的感受。

同樣是在〈論寫作(搞定遺孀)〉中，黃錦樹提到出於文學史的目的編撰的《台灣島民國時期的華文小說1945-2010》²²。這本書當然是作者杜撰，但書名卻取得如此有趣。我們從這個命名中可以看到邏輯，乃是將台灣島作為承載文學與歷史的主體容器，承載了諸如福爾摩沙時期、明鄭時期、清領時期、日治時期、民國時期等；但我們還可注意到後面所綴的年代「1945-2010」。1945年的台灣光復無疑是台灣島民國時期的開始，但卻停止在國民黨馬英九執政的民國九十九年(2010)。民國在未滿百年的存活中，在這本選集裏卻已走到了盡頭。黃錦樹為此虛構的選集杜撰此書名，讓讀者有兩種詮釋的可能。首先對黃錦樹來說，這一土地的保存期是比任何架設其上的「時期」更長久的。不同群體在不同時期來到這個島上，歷經各種變遷；最終不變的、「最後的家土」必然是標題中最前緣的「台灣島」。而另一點可從《聯合文學》的訪問中看到，黃錦樹呼應《民國的慢船》主題提到：「無論是以統還是獨，這個『民國』總有一天會結束，我們就在這個傷停時間中。就像足球比賽，因為受傷暫停而延長了一點點時間，台灣就在這樣的時延裏面倖存，如此弱而渺小，面對着強大的威脅。傷停時間裏一旦裁判的哨聲響起，一切就會結束，那是個人不能有異議的。那也可說是沒有時間的時間。我們在這樣的時刻裏生活、寫作很可貴，維持目前的現況很困難，而且這個現況非常不容易。」²³對黃錦樹來說，民國的「結束」是不可避免的，下一個「時期」可能是中共的「統」，抑或是台灣的「獨」，其實並不會改變此結果。

而在民國—台灣書寫馬華文學對黃錦樹來說，一直是一種從「僑」到「客」的身份，在民國這個特殊的「中華中心」短暫開啟的集散力量。如黃錦樹的僑生，到民國要找的除了出路之外，或許也是自己心中以華文為認同中心的故鄉之感。在〈他說他見過魯迅〉中，自新加坡到台灣留學而從此定居的周先生說道²⁴：

兩年後我中學畢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三反五反」，令我父親非常擔憂。恰好在台灣蔣介石政府向南洋招收僑生，我就搭上航向民國的慢船。不料就此走上不歸路。那之後，我就一直留在這曾經自稱是民國、越來越不被當做民國的島上，不知不覺也過了大半生了。

周先生還提到，他在新加坡念書那些年，華僑中學、南洋女中附近，多的是華文書店，那盛況，可能一直延續到七〇年代，當華小、華

中都被英文化之後，華文的讀者銳減。他來台灣後，偶然走過牯嶺街的舊書攤，讓他油然而生起故鄉之感。

這是一艘緩慢航向民國的船，還是從民國漸行漸遠的慢船？周先生在牯嶺街感受到的鄉愁，並非積累五千年的中華文化鄉愁，而是那移植到新加坡之後，發育不良卻曾經興盛一時的華人與華文文化。這鄉愁無疑是來自華夷交融後的新加坡——不是那種貼近於溯源的「華」，也不是後來靠向非華的「夷」。故鄉在小說中已逝於歷史時空的夾縫之中，周先生也成了存活於民國之中的那個新加坡的遺民。然而對於民國，他曾是化外夷民，後來成了這塊土地上的移民，但在民國漸離之後的台灣島上，又再次成為了民國的遺民、台灣的夷民。

從本文的角度來看，民國乃作為華文文學的進出口貿易平台，同時也是華文文學集體需要抗衡收編的中心力量。但華文文學之外存在另一個更大的漩渦中心——中國文學。台灣雖也作為華語語系文學各系統之一，但卻能串起各地華語語系系統，使之在出版、流通、閱讀過程中，與中國文學的大陸中心分庭抗禮。然而黃錦樹所擔憂的，或正是這一股串連進出口的力量，若為純粹的本土論者所建構的、只狹隘認同自身的唯本土中心是尚的觀點所束縛，則民國文學在這島上所成就的華文文學複系統可貴的繁花盛景，就無法維持下去了²⁶。《民國的慢船》中一篇小說的標題〈慢船到民國〉，特別強調了船的慢；人們到民國總是有去無回，船票也總只是買單程。搭上這艘船，最後是回不去還是不回去，是黃錦樹這一類到民國者必然面對的課題。而此書其中一個最大的核心問題是：民國不是台灣，或說台灣不是民國。民國在台灣主體建構的過程中，也在逐步削弱。慢船到民國，但民國也在搭着慢船前往不知終點的終點。

三 遲來的移民與馬華、台灣的兩屬/兩不屬

1986年9月28日中秋節，黃錦樹離開馬來西亞來到台灣，開始了居留以至生根於此的日子。散文集《火笑了》最後一篇收錄的〈幾個愚蠢問題〉，基本整理了作者本人在數年來的受訪經驗中，訪問者提出的「愚蠢問題」大集合。雖然黃錦樹說明這篇短文「取這題目純粹是為了節目效果」²⁶，但這些問題總糾纏不休也是實情。問題集榜首即是「為甚麼不寫作你的台灣經驗」²⁷。對此，黃錦樹標準的回答是：「我的寫作就是我的台灣經驗。我是來台後才開始寫作，以最優秀的台灣文學為參照，我的文學經驗就是我的台灣經驗。」²⁸當國民黨政權轉道台灣，進而持續着一個太平洋上的、屬於海上的中國時，台灣文學（台灣島民國時期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正統聲音，給這些華語語系地區的年輕作者所指引的，是一條接續了中國現代文學傳統的路。黃錦樹不似早慧且來台之前即已開始寫作並已聲名傍身的溫瑞安、李永平等人，他的文學摸索之路是從台灣大學男生宿舍的書桌上開始，在各大舊書攤之間逐漸羅織而成的：「陳大為、〔張〕錦忠和我都不同程度的提過，我們充分吸收台灣的資源，在這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裏，寫一些非台非馬的東西。」²⁹

黃錦樹自馬來西亞的離散始於留學台灣，正是馬來西亞教育體制下的一種被離散及自主選擇的綜合結果。幾乎可說離散與移動^⑳，開啟了黃錦樹作為作家與學者的養成之路。然而這樣的離散除了自主選擇外，仍舊帶有華文、華校畢業生乃至於華人在馬來人至上的政權治理下，華人使用特定語言、繼承特定文化的狀態下，不斷被當權的馬來政治力量離散的特徵。自主選擇是生命自己尋找的出路，而被馬來政權離散卻是基於血緣天生的困境。無論是被離散起點的馬來西亞還是離散終點的台灣，黃錦樹對台灣來說太過馬華，但對馬華來說卻早已屬台灣，這無疑是黃錦樹所代表的離散自馬來西亞的華人第一代（從僑生到入籍這段時間的身份），於台灣面對的實際情況。駱以軍就在和黃錦樹的對談中提到如此的移民第一代開始想像落籍於此的，「一種難以言喻的（對後代可能直面認同暴力的）不安和悲傷。老實說，我個人覺得這一系列的作品，不該再被（或只被）又放在『馬華小說』的脈絡窠臼中去談了」^㉑。也是留台後入籍的張錦忠為黃錦樹散文集《焚燒》所寫的序裏提到：「對我們這些在貧瘠世代活過半輩子的離散族群而言，老家那些永遠失去祖國的長輩凋零南方，意味着一個時代的結束，或與家鄉故園聯繫的斷裂。」^㉒對於離家在外的遊子，故鄉的時間在離開當下似即停止不再前進，而只存在於夢中。但文學的寫作者卻正是將故鄉存於夢中，不斷通過書寫夢中的時間進而記憶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時空。就如黃錦樹在〈散戲〉中寫道：「漫長如二三十年，我們離鄉日子的總和，壓縮。卻又好像十九歲時做了個離家的夢，醒來時青春已逝，父母俱亡。」^㉓

若讀者質疑黃錦樹不書寫台灣經驗，那自然是不公允的片面觀察。黃錦樹在與駱以軍對談時曾提到：「這十八年都是成年以後的生活，十八年來親歷旁觀台灣的戒嚴解嚴，日日讀報看新聞讀這裏各式各樣的出版品，不知不覺也和台灣人重疊了部分集體記憶。雖然我的活動空間相對的窄，大都在校園內，城市。但從台北到淡水，從新竹到台中、埔里，倒也走過半個台灣。當然，我有我的台灣經驗。」^㉔黃錦樹夫婦原國籍皆為馬來西亞，雖然來台時身份屬於「僑生」，但《中華民國國籍法》採血統認定，故祖上未有中華民國國籍的黃錦樹夫婦在身份上即屬於「外籍」。按《國籍法》規定，二人子女雖於台灣出生、成長，接受「國民」教育，但在黃錦樹夫婦未入籍台灣前仍歸於外籍身份。而迄今留台三十多年所共同承擔的集體記憶，早已不比1987年解嚴後出生的台灣住民少。當黃錦樹這一類遲來的移民面對台灣轉型正義中積極建構本土民族論述的當下，又能如何加入到這個以出生地為依據，但同時又講究祖輩血緣與此地連結時間長短的論述結構中去？

同樣在與駱以軍的對談中，黃錦樹提到：「台灣正值民族國家建國運動的熱潮上，這些年一直在獨立戰爭或統一戰爭的陰影裏。本土論者也快速的展開他們的排外論述，本省/外省的切分，對我而言，不過是重演了大馬種族政治土著/非土著的切分。後者是前者的未來，差別僅在於尚未結構化。對我而言，這是晚到的移民的悲哀，而且同樣的問題一再的發生。」^㉕這個問題的結構與馬華歷史和處境有其對應的可比性，而馬華族群在長久的種族論述中，根本的困境即是與馬來種族主義者對於「誰是馬來西亞人」、「如何才算馬來西亞人」兩個問題背後的種族平等議題，存在着無法解決的分歧。黃錦樹從移民

到新住民，再從新住民到台灣人的身份「被認同」路上，台灣記憶與經驗似乎比血緣所開出來的路，更加遙遠也更加崎嶇。而這條歧路，在本土論者要求遲來的移民停止離散的同時，也不斷在讓他們繼續受此意識形態的「被離散」：「在台灣生活了七年〔時為1993年〕，腳下這塊『蕃薯』不知不覺的已快要變成了第二故鄉。然而在綠色的本土論述和灰黃的大中華沙文主義論述的雙重搓揉之下，國籍（譬如大馬）、族籍（華裔——華僑？）、祖籍（譬如福建）……有意無意的被簡化成『外籍』，那是異鄉的標誌。在異鄉人的腳下存在的也只能是異鄉罷了。」^{③⑥}

雖然黃錦樹早已是國籍上的台灣人，但其新住民身份卻不斷在文字中訴說着國族主義建構下，新與舊的不斷被區分。新台灣人與原來的馬華身份無法分割，也使身份不夠純粹或「純正」。新住民的身份讓如黃錦樹般的後移民/夷民持續被離散，但同時之於馬華族群也已有着異鄉人的自覺，如前所述，讓黃錦樹從「外國人」變成「外國人」，其筆下把懷鄉作為回不去了的抒懷。其文學論述中亦提到：「這種狀態可能讓我們的寫作兩屬（台灣/馬華），但更可能兩不屬，因為兩地都有各自的地方主義的本土派。」^{③⑦}生活三十多年的時空，與台灣共享的集體記憶，實際在時間上已長於故鄉，而曾在馬來西亞的生活空間早已煙滅。此時身屬民國，而心的兩屬（或會被視為不選擇之下的兩不屬）正豐富了華語語系文學的多元歸屬、抵抗一元中心來自華夷之變的力量：「然而雙鄉是事實，一如日據時代台灣留日或『回歸祖國』的青年，也像東南亞諸國獨立前南渡或北往的中國知識青年；這應該是資源而不是認同或忠誠的選項。但畢竟兩鄉之間，是條荊棘之路，也許必然同時開闢兩個戰場。符號的調動，往往也造成理解的困難。」^{③⑧}

在華語語系的生成與流變的討論之外，黃錦樹的文學系譜似處於一個個已成形的華語語系系統之間，有其變異混成的可能性。當比較台灣文學與馬華文學時，讀者很快能發現後者的「華語」及前者的「國語」（及其他台灣境內語言的混雜）有着文字混搭排列組合根本上的分別。與李永平、張貴興等在台馬華作家特意使用綺麗純正的高雅中文不同，黃錦樹的文學語言中帶有的複雜性更能展示其有別於台灣文學語言的多元混雜。他提到自己寫作時的用字習慣，「很多用法，甚至（可能犯錯的讀音），都從數十年前的華小教育沿襲而來，有點像是身上童年時的老疤了」^{③⑨}。不同世代的教育體制在華文的建置上皆有其相異之處。從語言上看，「破中文」是否可以是好華文？黃錦樹「始終是不確定——身為華人，記憶裏交響着華語，一下筆就難免是『華文』，那是故鄉的情味，卻不免是大中華高雅美學憎恨的『美學雜質』」^{④①}。可正是此「雜質」，使讀者得以找到華夷之變的立基點。華語語系文學系譜之間的移動，在寫作與出版資源移動便利無遠弗屆的當下，將會成為更重要的文學資源。離散的被動性與移動的主動性，都將讓華語語系文學打開更繁複的局面。「民國經驗」的兩屬/兩不屬，正成了馬共與其歷史，夾纏在馬來（西）亞建國前後的身份定位屬性，以及最終只能在馬來西亞與泰國邊境包夾的和平村中安度餘年的處境，在小說中成為一種盆栽境遇的另一個對話體系。從這裏，可以繼續討論黃錦樹在民國—台灣生產馬共小說的內涵及意義。

四 在民國—台灣生產馬共小說的內涵及意義

(一) 馬共的餘年

馬共歷史具有的神秘性以及馬來西亞官方歷史的被刻意隱匿，對作家可謂極好的小說素材，而馬共總書記陳平（原名王文華）在黃錦樹小說中佔據極其有趣的象徵位置。1989年馬共結束武裝鬥爭、走出森林之後，陳平即移居泰國，上世紀90年代後陳平持續申請返回馬來西亞，但不斷被馬國高等法院以各種理由駁回。2013年陳平於曼谷逝世，馬來西亞政府甚至在邊防設下重重關卡，嚴防陳平的骨灰被偷運入境^④。現實中的陳平，其抗爭的生命在馬共走出森林之後其實已經結束，1989到2013年的二十四年，其實正是黃錦樹筆下這位馬共最後總書記在等待與失望中的餘年。馬共一直以反殖民作為主要訴求，但其在森林中的武裝抗爭卻一直延續到馬來西亞成立三十年後於1989年簽署《合艾和平協議》才正式解除。黃錦樹對這一點有透徹看法：「馬來西亞建國後它〔馬共〕其實就失去為『大義』武裝戰鬥的理由了，他們被英國人和東姑〔馬來西亞國父東姑阿都拉曼〕擺了一道，被置入歷史的無意義的時間剩餘。他們的歷史任務結束了，可是他們無法單方面的結束那場戰役。他們不知道（或許知道但也沒辦法），馬來西亞政府其實需要他們。他們沒有威脅的威脅讓政府獲利，內安法令和近五百個華人新村的存在，不就是最直接的證據嗎？」^④

馬共實際的抗爭其實很早即已結束，但它卻不得不「存在」，使馬國政府以馬共為名義，整頓他們想要整頓的人事物。當我們正視這一點時，會發現民國的「存在」與台灣島建立自我主體性之間的關係，雖然有着此消彼長的過程，但同時必須承認民國的「存在」對台灣主體建構的重要性。當下正流行的轉型正義作為對「民國歷史」的意識形態修正，也正是台灣主體生成的重要一環。從黃錦樹的文學創作中，或可見馬共之於馬來西亞和民國之於台灣的高度重合處。1957年馬來亞獨立，乃至1963年馬來西亞成立，後馬共的零餘價值乃其「被危險化」的虛構存在。「延長賽是尷尬的」^④，馬共的抗爭不過是消耗着這些曾滿懷夢想的左翼青年僅剩的尊嚴和餘年，也正因此，黃錦樹在〈雨紛紛〉中虛構了陳平想盡辦法返鄉，進而為他寫了一場潛行祭祖的失蹤記：「為了革命，為了同志的安危，他只好狠心斬斷一切。但在那一切一切都過去之後，深覺來日無多，身體髮膚日益衰朽（因攝護腺腫大而排尿困難，頻尿，腸蠕動差而嚴重便秘，皮膚過敏，齒牙動搖，心室肥大，膽固醇過高，糖尿病，牙周病，灰指甲，香港腳，陽痿），父母的思念重重敲擊着他的心，那促使他在最後的餘年一心想回鄉掃墓，到他們墳前叩頭告罪。」^④這是陳平的餘年，但何嘗不是被放逐的馬共的餘年？作者給陳平冠上了所有最隱晦卻又最腌臢的病體，這是馬共剩下的殘軀、逐步衰亡的必然。

在〈猴屁股，火，及危險事物〉（以下簡稱〈猴〉）中，黃錦樹提到兩位先後成功著陸到全權代表所處荒島上的人——日本人山本五十一（或指涉飛機被擊落的日本軍官山本五十六）及中國作家余秋雨^④。〈猴〉中並未告訴讀者山本五十一和余秋雨是否離開了那座荒島，但在〈雨紛紛〉中通過莫名出現在荒島的陳平眼中，看到假扮猿類的人變成了兩位。黃錦樹似乎為讀者接續往下寫

了〈猴〉並未結束、或他自己意猶未盡的故事。陳平到了小島後被全權代表要求唯一一件事^⑥：

那人手一揮，兩隻猴子把一面異味很重的旗遞給他。撲鼻的陳年尿騷味很嗆。像流浪漢的衣服。他不敢不接。輕觸，百納被似的拼貼，摸到很粗的針腳，上頭彷彿有字，餘火中依稀可見亂針繡成的「南洋人民共和國」七個像喇蚱的腳那樣筆劃長而怪，醜〔到〕不行的毛體大字。

國是繡在褲襠上的，大大的簡體字。繡得整塊布不規則的厚厚鼓起，像是裏頭埋了副風乾的陳年老陰莖睾丸。那人且遞給他一支摸起來濕濕軟軟還帶着溫度的筆（像身體的一部分），要他在很臭的「國」字旁簽名。

「簽……大家都知道那個名字？」

那人蛇吐信似的「嘶」的一聲，張口作勢要咬他。

他只好馬上從那支軟軟的筆擠出白色汁液簽下「陳平」，在斯大林、毛澤東、胡志明這些擠成一團的小字下方。

作者將〈猴〉的內容帶入到〈雨紛紛〉戴鴨舌帽男子（陳平）的夢中，讓這位馬共總書記在夢中的孤島上，為被放逐的「南洋人民共和國」背書。國旗曾在〈猴〉中出現，被余秋雨質疑「國旗？國家就這麼一座鳥不生蛋的石頭島？」，山本五十一只回應「對神經病來講其實都一樣」^⑦。而此處黃錦樹提醒國旗上「南洋人民共和國」的字體，乃如其小說集《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封面上的標題毛體字，以封面形式讓讀者回顧前作，以理解小說中旗幟上那「醜〔到〕不行的毛體大字」。行文中使用中共於1956年通行的簡體字，讓陳平簽名的工具還貌似被閹割下仍能擠出精液的陽具。「南洋人民共和國」在如此落魄醜陋的狀態下被瘋狂地呈現，但卻承載着共產主義重要領袖或真實或夢幻的簽名背書。



《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封面上的標題毛體字（資料圖片）

（二）「南洋人民共和國」敘事

綜觀黃錦樹小說中的「南洋人民共和國」敘事，大部分乃存在於筆記或夢境中，否則就是瘋狂的臆想。但收錄於《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的〈那年我回到馬來亞〉（以下簡稱〈那〉），其人民共和國才真正在情節敘述中存在。小說中的馬來亞已被共產主義「解放」，馬來貴族及平民因勞改與大遷徙計劃遠走他方，進行屬於馬來人的、新的離散。這篇小說可看成是擴寫的〈馬來亞人民

共和國備忘錄》——小說中回歸社會的老金不斷杜撰的共和國歷史筆記在這裏成了真實⁴⁸。但從《民國的慢船》的互文寫作手法來看，這裏的馬來亞或也可能只是老金的筆記本上虛構的內容。所有老金在書寫時面對的難題，在〈那〉的情節中都成真了，而這些可能的亡國記事卻又是小說中「我」的父親李鼎彝（與李敖的父親同名）刻寫在棺材板內的預言⁴⁹。這樣的高度互設、互涉的寫作手法，讓某篇章作為虛構的記錄出現在其他篇章的真實情節，模糊了讀者辨別小說情節的虛實邊界。各個情節成了黃錦樹小說不同維度的平行宇宙，偶爾互滲，如真似幻。而作者的本心，也就藏在這平行宇宙萬花筒之後。當讀者細心檢視〈那〉的故事情節：其時台灣已被中共收復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我」在馬來亞時期因參加共產黨活動被英國人遣返中國，到中國後因馬來亞華僑的多元背景，後被調派到台灣主管少數民族事務。這裏可以看到台灣作為中國一省時，已將民國數十年經營下作為自由中國的代表性取消，使台灣的位置變成了可有可無的「沒有」。

在小說〈那〉的開端，「我」因父喪而再度回到已無馬來人，且高壓閉鎖的馬來亞。隨着小說行進，「我」最後面對了父親早已預言過的馬來人的反撲，馬來亞人民共和國岌岌可危。在〈馬來亞人民共和國備忘錄〉裏，老金的遺物中發現的筆記本，以虛構的方式將戰死的戰友起死回生，建立了馬來亞人民共和國（筆記中亦有稱之為「南洋人民共和國」）⁵⁰。雖然筆記中以類似小說的虛構筆法可無限上綱地創造烏有史，但烏有史所立基其上的現實仍不斷以各種雜訊浮現於各處，讓人民共和國在虛構中不免走向滅亡。馬來皇室的土地權、教育、語言、宗教、種族一直都是馬來（西）亞種族之間面對的難題，社會主義並無法在臆想中真正解決這些問題，故老金的筆記本最後只剩下「難搞」兩個大字⁵¹。而在〈那〉裏「我」父親的老友 Dr Chong（鍾博士）作為總理，將老金的遷徙計劃付諸實行：「『冷藏行動』把馬來土邦的皇族集體送到西伯利亞去勞改，不到十年，倖存下來的是個位數。據說 Dr Chong 竟然還冷酷的說：『沒想到馬來人這麼怕冷。』空下來的十數間皇宮和廣大的園林，都被規劃來發展觀光。」⁵² Dr Chong 從君權入手，將佔據原生土地擁有權的皇室全體驅離，以共產黨下鄉改造的名義，行充軍發配的實質懲罰。而「種族互換協議」更是釜底抽薪，試圖以移動與遷徙作為手段，讓土地與種族的關係單純化：「『大遷徙』把八成的馬來亞馬來人（四百多萬）強迫遷往印尼人民共和國（其他兩成逃入大森林，與 Orang asli 混居，甚至冒充他們），以交換印尼境內的五百萬華人（兩國簽署了『種族互換協議』）。過程長達數年，那些年馬六甲海峽幾乎沒法讓商船通行，密密麻麻都是人口遷徙的船。」⁵³ 如此是將華語語系打破國族、語言、文化單線必然關聯的反向操作。這裏將血統的承繼作為最廣義的「華」的定義，將這些早已散落各地、成就不同華夷變態的華人聚集起來，試圖建構一個唯華無夷的單元國度。然此做法無疑是將土地冠上種族主義的內涵，也不過是將真實世界中現行馬來人的「土地之子」概念抽換符指，以期達到皆有所「歸」的結果。從執行上的困難就能知道⁵⁴：

許多華人其實不願意離開印尼，他們的祖先有的是從明代就過去的。況且那些華人富豪的大豪宅又搬不走。馬來人眷戀他們的甘榜〔馬來語的村

莊)、土地和牛。間中衝突不斷，反對搬遷者的激烈抗爭造成數萬人死傷。父親是這計劃最主要的反對者，認為那太過殘忍。指出半島上的馬來人雖然有的從印尼過來不過三五年，數十年，但有的超過六七百年了，怎麼可以把他們強行「遷回原居留地」？當時Dr Chong的反駁令他無言以對：「你那在新加坡土生土長的兒子，還不是被英國佬遣送回中國？他是第幾代移民？那些馬來人不也常吵着，要支那豬滾回支那嗎？」

經過數百年的移動及演變，南洋地區的種族混居產生各自與土地的連結，無論是本土還是他者，華夷變態早已發生，如何能在小說中回到純粹？黃錦樹擅用火與土象徵華人在移動過程中的兩層重要聯繫：火作為中華文化、文字傳承的接續意義；土作為在地化的夷質變遷。並不是所有華人都想「成為華人」，小說中那五百萬印尼華人應有權利不離開印尼。這並非因為血統上是否為華人這種本質性分類問題，而更多是由於這些華人早已落地生根且開花結果，已於在地混成的本土成份。小說中Dr Chong以禁用馬來文的法令，試圖進一步將土地與種族的關係更「純粹化」。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極富啟發性的《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揭示道：「民族就是用語言——而非血緣——構想出來的。」⁶⁶故使用馬來文即變成擾亂民族建構的雜訊，不同的語言聲腔乃成了顛覆種族單一國家的利器，唯有予以禁止。國家內部只能有一種聲音，一個民族一個語言，這也是現實中馬來政權治理術的挪用：“Bahasa Jiwa Bangsa”（「語言是民族的靈魂」）⁶⁷。小說中母親作為單一語言的使用者，在馬來亞禁止使用馬來語後，即喪失了話語權而暗啞無聲。黃錦樹為讀者揭示了橫向移植純粹的華人及中華文化到他方的夷地，或反過來說讓作為夷質的「華」入侵這非華地區並試圖取而代之，其所遭遇的反抗並不易消解。文化在歷史進程中是一個混搭、融合、相互消解乃至不斷變態的過程，若無法認清這一點而力求那鐵板一塊的「結果」，則必然招致滅亡。父親李鼎彝在棺材內以預言的方式寫下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亡國紀，或可視為對試圖以傳承純粹中華文明作為民族終點的馬華族群的一記警鐘⁶⁸。

黃錦樹早在1997年寫成的〈中國性與表演性：論馬華文學與文化的限度〉一文中就提到了時移勢易，馬來西亞獨立後華人與中國在政治意義上早已分道揚鑣，中國是中國，華人是華人：「……在情緒上又一再揚升至文化將亡的集體悲哀，甚至把大馬華人的傳統文化將亡混淆為傳統中華文化將亡，在意識上回到國家獨立前大馬華人與中國的一體感中去，其時華人的舉措確實對將亡的中國之存亡有所影響，而此時中國是中國，華人是華人，影響所及不過是大馬之內的華人傳統中華文化的『國中之國』（相對於政治上的『國中之國』），甚至只是華人集體的『內在中國』，換言之，危及的是內在與『華人』定義的中國性。」⁶⁹隱於此文背後的，是一再提醒馬華，所謂「傳統文化」或早已在歷史的進程中不再等同「中華傳統文化」。經過土地的浸潤，這些「傳統文化」早已是混融於斯土的、屬於馬華族群而非那想像的「中國人」了。行文至此，筆者以為從黃錦樹的馬共書寫及其中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亡國紀，當可得到華夷之變視角的啟發：純粹的「華」之移植乃不可能。

(三) 馬共的歷史負債與馬華族群的游離

關於對馬共的念茲在茲，黃錦樹雖說「其實我並不是那麼自覺的在寫甚麼馬共，看到統計數字自己也嚇一跳」，但隨後即補充「其實並不奇怪，……我的馬華文學一開始就和華人史的思考脫離不了干係」⁶⁹。對於馬共為馬華族群留下的歷史負債，黃錦樹亦說到：「我們成長於（大馬）歷史終結之後：精鋼鐵籠已造好了，此後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件，只有無力的掙扎與無用的感嘆。吶喊過，徬徨過，接着以冷嘲。但又有甚麼用呢？」⁷⁰於其而言，馬華族群在後馬共時代所承受的各種待遇，皆帶有無法改變的歷史遺迹。馬共在國家意識形態下，逐步因那一代人的逝去而正式走入歷史，或將逐漸被淡忘；但因馬共而留下的華人新村還遍布整個馬來半島，馬共為馬華族群留下的歷史及其造就的國家意識形態，直至今日仍未散去。

黃錦樹離家前往民國一台灣，或說是一代代馬華青年的離家，部分原因終究無法脫離種族主義的大環境使然。從馬來半島的馬華族群歷史語境順勢而下，馬共的出現、存在、變奏、衰亡，每一項都參與了將馬華族群導向現階段的處境，即黃錦樹筆下不斷檢討的民族、文字、文化等的貧弱狀態。如此馬華處境，讓黃錦樹或其同路人不斷產生游離心境，將自身向國境之外漂流。黃錦樹從馬華移民第三代，變成了台灣新住民第一代的生命軌迹，部分可說是承繼自馬共所留下來的「歷史終結之後」那完而不了的債務。從以上的連結來看，黃錦樹小說中念茲在茲的馬共，雖不曾真實出現在其經歷中，但卻從遠方協力造成了將其涵括在內的、當下馬華族群生命在實質或心靈上的游離。馬共作為原生債務讓馬華族群揮之不去，故黃錦樹小說中，常見到鬼魅、風乾的手，或附身寫作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的祖先亡魂⁷¹。馬共的陰魂不斷跨越時空，進行各種不同的書寫，也象徵了其不曾逝去、對當下馬華族群處境的潛在影響力；而全體馬華族群也無可奈何地只能參加這場「延長賽」。歷史進程中，華夷之變帶來的已不是靈根自植或是落地生根，經過百年的移民史，後移民的第二、三代甚至已到了第四代華人的境遇，或應自覺其交融與擴充的華夷之間「純粹」的消解，已開花結果復又重新果落生根，甚至已自馬來西亞再移動/移民了。黃錦樹的後移民/夷民身份，正展示了馬華作為源頭，在民國一台灣落地卻無法簡單生根的新住民一代，如何見證此尚未及扎根，又將緩慢逝去的時間節點。

五 民國與馬共——大歷史與小歷史的敘述與連結

從黃錦樹的文字中，可見其從僑生到新住民身份的自夷入華發聲位置，並從中看到民國在台灣島及南洋華人的生命境遇中所產生的內爆動力。黃錦樹作為小說家的同時，更以知識份子的論述模式從另一面向介入到民國內外，尋找那一艘歷史的「破船」/「慢船」。黃錦樹從馬國及馬華族群身份進入民國，這個背景成為了其文學內涵重要的歷史框架。當他為一群被歷史敘事逐漸抹去及遺忘的零餘者——馬共寫作時，黃錦樹在台灣島上催生的「南洋人民共和國」，乃於無中生有的寫作中，從「烏有」的寫作生出歷史最終的「沒有」。這些「沒有」

在大歷史中，顯現出歷史在偶然的境遇下走向冥冥中必然的結果。大歷史的敘述與個人小歷史的連結無可分割，卻又無法以小撼大。這些「沒有」也代表了中華正統的「沒有」，解構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同版本的神話敘事。黃錦樹小說中的人物在共做一個民國夢/人民共和國夢，但這個夢最後都歸於無有，乃無所託的烏有之夢。黃錦樹在《民國的慢船》的〈跋〉曾寫道^②：

台灣的局勢令人生厭，民國的歷史顯然已進入傷停時間，因此書名最初擬做《離開民國的慢船》；但大馬的環境看來也並不友善，因此書名一度又擬為《航向民國的慢船》。然而，民國這艘船畢竟泰半都沉沒在過去了，也許只有翹起的船尾一角還勉強是乾的。去除向量之後，在去來之間，老舊的破船只剩下它自己，擱淺在赤道無風帶。《民國的慢船》這書名是從「航向民國的慢船」及「離開民國的慢船」省略下來的（「航向民國的慢船」/「離開民國的慢船」），箇中的「的」的所有格是假的。書名包含了去與來，在去來之間，也可說是一種流亡的狀態，沒有位置的位置。

黃錦樹筆下擱淺的民國正走向變革的過程，未能停止。故這傷停時間裏，寫作成了截取時間的一種手段。然在如此截取中，只能為其寫下可悲的宿命論。「南洋人民共和國」的亡國紀，是小說還沒開始前就注定好的。

小說作者自身的移動經驗及其筆下的人物視角間，所交織而成的華夷共生結構值得讀者關注。黃錦樹1986年的啟程，乃作為僑生介入到台灣島民國時期的歷史脈絡中，也正趕上了戒嚴時代的末尾。黃錦樹來台時，正遇上在1980、90年代這個民國歷史的轉型期中，台灣本土性與民國所帶來的正統性此消彼長的拉鋸。「僑」之身份是否應限縮到曾具民國身份者及其後代（而非如黃錦樹此類與民國實際並無關聯的「外國華人」），甚至馬華不再傾向以「僑」自居於民國—台灣，這些問題正讓黃錦樹得以重新思考馬華族群在土生土長、卻總被離散於外的「異地」馬來西亞，應如何正視及調整自己的立足點。可是當他入籍台灣後，卻又一次複製了馬來西亞馬來人與華人間糾結的國民身份結構——誰才是斯土更合理的住民，所爭者卻不過是先來後到的順序時長罷了。其小說開展的內蘊是當代移動蔚為風潮的語境中，早已無法單以內外、我他的華夷之辨做出分別的現實。黃錦樹成為其中一位離開故鄉的遊子，在這移動中習得了寫作技能。父祖輩傳下來的薪火，就着他曾經生長的斯土，成為了他寫作中最重要的兩個元素。

馬共與其他各種敏感題材於在地馬華文學中自帶一種無法放縱書寫的氛圍，使相關寫作及出版受到各種內外機制的局限，但民國—台灣作為一個文學的中繼站於二十世紀末扮演的重要樞紐角色，讓馬華文學在境外開出有別於境內較壓抑的繁花勝景，在民國位置上加重了馬華文學敏感議題的書寫力道。從研究者的角度來看，筆者以為「移動」作為馬華文學不可迴避的歷史現實，已產生了極其重要的、不在馬來西亞的另類混成文學底蘊。黃錦樹筆下大量馬共書寫，讓馬共的歷史走出國境，如同作者的身體、小說的出版都必須離開斯土方能展開一般。在黃錦樹的移動中，馬共一再被召喚，馬共歷史參與造就的馬國政策及意識形態，讓黃錦樹等數萬學子離開馬來（西）亞，走向族群的二度離散。他說^③：

我寫馬共題材的小說時，馬共的歷史基本上已經結束了。……我們已沒有那歷史的急迫性，那種現場感、那種介入的可能。……那「此時此地的現實」，已成過往雲煙。時間的距離讓我們的寫作必然是另一種寫作，但也有相應的優勢——因為句點已經出來，各方的文獻也逐漸不再是秘密。因而可以從更廣泛的視野看待那場革命，可以看到各方的觀點和態度，而不為大馬官方，或馬共官方的視野所限。

黃錦樹提醒讀者要把其小說看作是另一種寫作，他所要說的故事並不限於那鬥爭的四十年，可以是更長遠的故事；他要說的也不只是那些鬥爭的先賢，卻更多是句點之後的那些承擔歷史遺贈或債務的、薪火相傳的一代代華人。

不管從作者自身或是小說世界來看，中國、民國、南洋、台灣其實都是各自的中心、自身的「華」，都有着不斷涉入他者中的夷質。黃錦樹介入民國的方式，當然不只帶有馬來西亞立場，而是同時帶有民國—台灣如何形成的歷史背景；這二者又不是那個在自我建構中從來如此的結果，而是與這些現實生命情境相互勾聯融合、建構又同時消解的華夷之變過程。故我們若定要將這些作品粗略地置回華夷之辨的楚河漢界中，必將遇到各種單一視角及語境無法解決的問題。華夷間在移動的風潮下早已產生邊界模糊的間距，以虛構的文本介入，讓我們看到華夷間距的增加、混搭，而曾經被想像建構的、被以為原有的華夷邊界正逐步減退。當馬共之於黃錦樹來說是不曾經歷的、帶有時差的債務，則民國於他又是一種帶有時差的遺贈。這兩者不論是負債抑或遺贈，都已在這開往消亡的慢船上，等待被一層新的集體記憶覆蓋。黃錦樹身上所帶有的歷史的零餘，也持續在其文學創作中完而不了地顯現着。黃錦樹無疑是後馬共時代的書寫者，卻同時看着民國的慢船漸行漸遠，自身也或將成為那個中華意識形態正朔的「民國」在二十一世紀的「遺民」。馬共抑或民國，如此梳理看來，其意義在黃錦樹的小說中其實並無二致。

註釋

① 中華民國教育部《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中提到：「所稱僑生，指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並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回國就學之華裔學生。但就讀大學醫學、牙醫及中醫學系者，其連續居留年限為八年以上。」故此處所稱僑生應為（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身份者或其子女，方有「回國就學」的事實。按照外國（非台灣）華人的定義，如黃錦樹這類先祖於中華民國建國前，即移民海外延續至第三代的華人，多稱為「華裔」或「華人」。然而法規中另有一條敘明「僑生身份認定，由僑務主管機關為之」，則政策上的認定，乃可以中華民國中心輻輳而出，將他國華裔/華人全部涵括在內，成為語意模糊的「僑生」。法規全文參見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9263>。

② 黃錦樹：〈非寫不可的理由（初版《烏暗暝》序）〉，載《烏暗暝》（台北：麥田出版，2017），頁460。

③ 詳見王德威：〈華夷之變：華語語系研究的新視界〉，《中國現代文學》，第34期（2018年12月），頁1-28。王德威於文中強調行動中的人間（vita activa）與思考中的人間（vita contemplativa）之辯證對話：行動與語言創生的無限可能。且人文學者應特別注重華夷風研究「言」與「文」與「變」的聯動意義。這不僅因華夷論

- 述奠基在言說表述上，也因對言說所投射的想像共同體（及非共同體）將研究重點帶向文和「文」學因時因地而變的層面。而當華夷之「辨」轉為華夷之「變」，研究者方意識到批判及自我批判的潛能。王德威華夷之變的觀點乃有關「差異」的政治學，但並非一種本質化的「差異」（difference）觀點，而是強調「間距」（écart）觀。
- ④ 本文以「民國—台灣」時期指稱台灣主體意識建構過程中，民國及其「中華代表性」逐漸式微，並被台灣意識逐步取代的時段。「一」符號代表了此為正在發生的過程，以及這一過程中的間距位置。而本文使用「民國」一詞時，意思則更接近於「中華民國」作為族群中心的意識形態及其從建構至逐步減弱的全時期。
- ⑤ 黃錦樹：〈我們的民國，我們的台灣〉，載《火笑了》（台北：麥田出版，2015），頁249。
- ⑥ 黃錦樹：〈大卷宗〉，載《烏暗暝》，頁227-42。
- ⑦ 參見高嘉謙：〈離散馬華與文學史：黃錦樹的論述／小說個案觀察〉，載《馬華文學批評大系：高嘉謙》（桃園：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19），頁156-87；顏健富：〈惡聲與憂患：論黃錦樹的「憂族」書寫〉，載張錦忠編：《離散、本土與馬華文學論述》（高雄：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19），頁219-53；黃祖恩：〈生與雨的歸返：黃錦樹《雨》中生殖與雨之意象探討〉，載熊婷惠、張斯翔、葉福炎編：《異代新聲：馬華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高雄：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19），頁217-30；劉淑貞：〈倫理的歸返、實踐與債務：黃錦樹的中文現代主義〉，《中山人文學報》，第35期（2013年7月），頁69-99；高嘉謙：〈歷史與敘事：黃錦樹的寓言書寫〉，載《離散、本土與馬華文學論述》，頁199-218；Show Ying Xin, "Mapping the South Seas: The Communist Fiction of Ng Kim Chew", 《中山人文學報》，第41期（2016年7月），頁97-116；張斯翔：〈論黃錦樹「後」馬共書寫中的抒情意識：從《火，與危險事物》談起〉，《中外文學》，第48卷第1期（2019年3月），頁163-97。
- ⑧ 黃錦樹不止一次在文章中提到如斯提問，並在《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的序中說道：「相較於紛紛去寫長篇的同代人，我沒那個興趣，也沒那麼大的野心。況且，很多長篇（包括一些三部曲）我認為那題材如果寫成短篇，或許會更有價值些。相較於長篇，我比較喜歡書的概念，那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整體。」參見黃錦樹：〈關於漏洞及其他（自序）〉，載《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8。
- ⑨ 黃錦樹：〈細雨微風〉，載《民國的慢船》（八打靈再也：有人出版社，2019），頁147、139、149。另可參見黃錦樹：〈最後的家土〉，載《猶見扶餘》（台北：麥田出版，2014），頁247-67；〈魚骸〉，載《烏暗暝》，頁429-50；冰谷等編：《膠林深處——馬華文學裏的橡膠樹》（柔佛：大河文化出版社，2017）。
- ⑩ 黃錦樹：〈細雨微風〉，頁148-49。
- ⑪ 言叔夏：〈書人物——黃錦樹修補一條叫歷史的破船〉（2013年9月14日），中時新聞網，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20130914000698-260116。
- ⑫⑬ 鏡子：〈馬來西亞華文文學隨時可能消失，而我剛好身在其中〉，載黃錦樹：《民國的慢船》，頁245；249。
- ⑭ 南洋客：〈那年我不回馬來西亞〉，《季風帶》，2019年4月，頁68-69。
- 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黃錦樹：〈那年我回到馬來亞〉，載《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頁41-61；57-58；46；46；46-47；57。
- ⑳ 黃錦樹：〈那年我回到馬來西亞〉，載《猶見扶餘》，頁205-37。
- ㉑㉒ 黃錦樹：〈論寫作（搞定遺孀）〉，載《民國的慢船》，頁163。
- ㉓㉔ 黃錦樹：〈跋〉，載《民國的慢船》，頁233。
- ㉕ 此處借助王德威華語語系研究中提到「將中國包括在外」的修辭策略，表達台灣文學與馬華文學場域中，黃錦樹不可或缺、但卻未必能完全融入的尷尬處境。參見王德威：〈華夷之變〉，頁18，註釋77。就黃錦樹自己所言，無論是兩屬或兩不屬，其文學身份都只能在台馬之間游移不拘，不斷被包括在外。相關書寫可見黃錦樹：〈在兩地本土論的夾縫裏〉，載《焚燒》（台北：麥田出版，2007），頁133-36；〈馬華文學無風帶〉、〈蘆花江湖——留台這些年〉、〈我們的民國，我們的台灣〉，載《火笑了》，頁124-34、135-46、247-57。
- ㉖ 參見黃錦樹：〈火笑了〉，載《火笑了》，頁184；〈Negaraku——旅台與馬共〉，載《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台北：麥田出版，2015），頁281-313。

- ②③ 林徽俐：〈身在開往民國慢船的人，黃錦樹：這個民國，總有一天會結束〉（2019年7月4日），《聯合文學》網，www.unitas.me/?p=9549。
- ②④ 黃錦樹：〈他說他見過魯迅〉，載《民國的慢船》，頁100。
- ②⑤ 在台馬華文學的複系統相關論述，參見張錦忠：《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台北：麥田出版，2003）。其中黃錦樹的代序亦對此議題提出意見，參見黃錦樹：〈反思「南洋論述」：華馬文學、複系統與人類學視域（代序）〉，載張錦忠：《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頁11-37。
- ②⑥②⑧ 黃錦樹：〈幾個愚蠢問題〉，載《火笑了》，頁293。
- ②⑦ 黃錦樹：〈幾個愚蠢問題〉，頁293；〈我們的民國，我們的台灣〉，頁247-48。
- ②⑨ 黃錦樹：〈郁達夫的骸骨加工業〉，載《註釋南方——馬華文學短論集》（八打靈再也：有人出版社，2015），頁124。
- ③⑩ 本文較多使用「移動」而非在馬華文學研究中更常見的「離散」。離散研究在一般情況下非常重視主體的所來之地。在馬華文學中除了必須面對來自外部政治力量的「被離散」境況，更應正視作者及文本作為主體不斷移動(move)的過程。移動可以不止一次、永不終結；它所具有的不特定起點和終點，以及其自主選擇權，都是新世紀馬華文學研究的新重點。
- ③⑪③②③⑦ 黃錦樹：〈與駱以軍的對談〉，載《土與火》（台北：麥田出版，2005），頁316；316；317-18；317。
- ③② 張錦忠：〈散文與哀悼〉，載黃錦樹：《焚燒》，頁8。
- ③③ 黃錦樹：〈散戲〉，載《火笑了》，頁208。
- ③④④④ 黃錦樹：〈華文的遭遇〉，載《土與火》，頁333。
- ③⑤ 黃錦樹：〈台灣經驗？〉，載《土與火》，頁14。
- ③⑥ 黃錦樹：《魚》（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297。
- ④①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馬共即轉向反殖民運動。1948年6月，以三名歐洲籍的園丘主管被殺害為由，英殖民政府宣布馬共等左翼政黨為非法組織。1949年，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後改名「馬來亞人民軍」）成立，至1960年代在馬來半島上展開游擊戰，後轉移至馬泰邊境。1955年「華玲談判」因馬共與自治政府未有共識而宣告破裂。1989年12月2日，馬共於泰國政府見證下與馬來西亞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議》並宣告解散。此時馬共約有1,188名活躍黨員，部分回到馬來西亞定居，另一部分則選擇留在泰國邊境和平村內。陳平因身份特殊不被允許回到馬來西亞，直到2019年9月16日，陳平的骨灰終從泰國被偷運回馬來西亞。
- ④②④③ 黃錦樹：〈關於漏洞及其他（自序）〉，頁7。
- ④④④⑥ 黃錦樹：〈雨紛紛〉，載《民國的慢船》，頁64；81。
- ④⑤④⑦ 黃錦樹：〈猴屁股，火，及危險事物〉，載《刻背（全新修訂版）》（台北：麥田出版，2014），頁175-200；196。
- ④⑥④⑧④① 黃錦樹：〈馬來亞人民共和國備忘錄〉，載《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頁63-83；79；83。
- ④⑤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205。
- ④⑥ 自1960年代始，馬來西亞政府在推行國語政策時即以“Bahasa Jiwa Bangsa”為口號，強調馬來語作為各民族通語的重要性。就此課題黃錦樹亦發表論文，參見黃錦樹：〈馬華文學與（國家）民族主義——論馬華文學的創傷現代性〉，《中外文學》，第34卷第8期（2006年1月），頁175-92，後收錄於黃錦樹：《馬華文學批評大系：黃錦樹》（桃園：元智大學中文系，2019），頁93-122。
- ④⑦ 黃錦樹：〈中國性與表演性：論馬華文學與文化的限度〉，載《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增訂版（台北：麥田出版，2012），頁71。
- ④⑧④⑨ 黃錦樹：〈衣以風，飲以雨——馬華文學與馬共小說〉，載《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頁364。
- ④⑩ 黃錦樹：〈生命的剩餘〉，載《焚燒》，頁12。
- ④⑪ 此類意象出現在黃錦樹〈大卷宗〉、〈螃蟹〉（載《猶見扶餘》）、〈魚〉（載《魚》）等小說作品中，而作品時代橫跨其大半個創作生涯。